



Videre“调查员”使用过的偷拍设备。

上接 B02

2005年,在希望和失望之间,雅科布维奇加入了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帮它创立了摄像部。他们向与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一起的巴勒斯坦家庭发放了摄像机,让他们公开拍下与以色列人发生的冲突。其中一个系列在以色列广为人知,也在BBC和CNN播放了:希伯伦一个巴勒斯坦家庭不断受到定居者的谩骂,一名以色列妇女不停地骂一位16岁的女孩是“婊子”。“我想,人们看到这样的话从一名信教的女性口中吐出,感到非常震惊。”雅科布维奇说,“更令人震惊的是,有两名士兵就站在旁边袖手旁观。”

雅科布维奇的工作为他招来了仇恨邮件和死亡威胁,但他相信,这些工作帮助减少了针对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在人权斗争中,你不会打硬仗,获大捷。”他说。“胜利是一点点的,艰难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带来改变。”他开始思考能否让同样的模式发挥更大影响。

大约同一时期,乌里·弗鲁什曼也在考虑类似问题。弗鲁什曼是Videre理事会主席,他沿着一条看似不可能的道路走到了人权事业中:作为一名成功的娱乐业高层,他曾制作好几部电影,包括小有名气的《辣妹世界》。他跟安妮·莱诺克斯(著名女歌手)结婚12年,有两个孩子。58岁的弗鲁什曼性格随和,人脉甚广。在跟另外一位朋友聊天时,弗鲁什曼有了一个想法:电影业设备淘汰很快,何不趁机收购一些旧摄像机,用来记录侵犯人权的情形。1990年代,他曾参与西班牙马略卡岛的环保运动,拍摄了一部短片,介绍黑秃鹫所处的困境,帮助筹到不少钱,弗鲁什曼由此开始思考电影作为人权斗争武器的可能性。

和雅科布维奇一样,弗鲁什曼在以色列军队服役时也曾碰到麻烦。1970年代他曾拒服兵役,后又因为拒绝服从命令被其他士兵殴打。弗鲁什曼说,他上过八次军事法庭,每次都要被监禁一个月。“我一直对公平有强烈的追求,或者说对不公有强烈的憎恨。”退役后弗鲁什曼成为嬉皮,在欧洲漫游,然后回到以色列,成为摄影师。最后,和雅科布维奇一样,成为纪录片制作者,现在是伊灵电影公司合伙人之一。

2008年弗鲁什曼到了西岸,想为项目找个合作伙伴。“有人对我说应该找奥林。”他说,“我们见了面,一起在西岸转悠了一圈。”

弗鲁什曼回忆说,1991年罗德尼事件是导致Videre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罗德尼·金是一名非裔美国人,在洛杉矶遭到5名白人警察殴打。施暴者挥舞警棍时,被当地一名居民拍到,视频传遍世界。当那些警察被判无罪时,群情激愤。弗鲁什曼就想:如果每次违章停车都可以拍下,为什么不能试着拍摄侵犯人权的事件呢?他将这种想法描述为“小弟将镜头对准老大哥。”

在 Videre一个地区办公室,几名员工坐在屏幕前回放视频。视频中10名女性正在描述她们遭到25名男人多次强奸和暴力殴打的情形。她们不认识所有攻击者,但知道其中一些人依然住在她们的社区里。一名女性回忆着一名地方官员鼓动那些男子侵犯她的情景。“他们随意带走我们,把我们当东西一样分享……直到天亮时才结束。”她说,“我被迫跟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跳舞。他说他是我当天的丈夫。我甚至记不起后面那些强奸我的人。”

一名女子说,那些男人来找她丈夫寻事,丈夫逃走了。而她正怀着身孕。“我恳求他们手下留情——他们说不在乎,这是政治。”她说。“被打之后,我开始流血,

然后晕过去了。”她说自己在无意识状态下遭到多次强暴。“后来我恍惚听他们说:是个男孩。我流产了。(村里一个人)把孩子收走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把孩子丢哪儿了。”她后来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因羞于告诉丈夫,导致他受到感染。她曾去警察局报案,但“他们鼓掌大笑。”Videre通过可靠的地方联系人联系到这些受害者,跟她们建立信任,鼓励她们发声。Videre希望有朝一日犯罪分子受到审判。那名流产的女子说:“我们仍跟犯罪者生活在一起,他们仍在折磨着我们。”

Videre在一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办公室,作为搜集、处理和发布视频的根据地。Videre行动人员坐着公共汽车把“调查员”拍下的视频偷带过来,三名全职工作人员之一的埃迪(假名)在汽车站与信使会面,但事先对信使的身份及如何找到他们一无所知。

“拿视频时总会碰到问题,”埃迪说。有时交接很顺利,硬盘包在报纸里或者放在一个废弃的信箱里。但更多时候,信使不知所踪,或者电话接不通。埃迪在汽车站转来转去,有时只好打电话给远在另外一个大陆的卡洛斯,询问信使的模样。

Videre工作人员只知道信使和“调查员”的代号,只有卡洛斯知道他们真正的身份,通过电话、邮件和Skype指挥整个行动。每次通讯都是加密的,卡洛斯使用HushMail和Tor.TrueCrypt加密和伪装文件,以此保护硬盘。加密过的硬盘假如被连接到没有使用TrueCrypt的电脑上,点击一下就会删除所有资料。视频储存在SD卡上,然后复制到硬盘上,伪装成mp3或者.mov文件,再进行加密。

Videre办公室有着强大的服务器,放在可容人进入的保险柜里。录像从硬盘中取出来,工作人员使用CatDV软件对录像归档、编制目录。在真正的内容出来之前,往往有长达数个小时沉闷、无用的片断。但如果Videre够幸运,会有一些视频质量不错。更常见的情况是图像质量不错,但声音质量很差,或者反过来。

Videre档案保管员索尼娅(化名)就来自那个“恐怖国家”。她父亲曾遭监禁,叔叔被政治对手杀害。对她而言,这些录像有特殊意义。“我看的不仅是录像,我就是录像本身。”她说,“我们不知道是谁拍摄了它,我总是想象可能是我自己的父亲或表兄弟。”她不能告诉家人或朋友自己的工作性质。她说,这就像淘金,你可能得筛选40个小时才能看见一小块金子。她和同事向卡洛斯作出反馈,卡洛斯再转告“调查员”,希望他们下次能提供更好的录像。

索尼娅的同事迈克(化名)负责编辑录像,以供发布,也来自那个“恐怖国家”,他说看录像时既难过又专注。很多片断是在偏远地区拍摄,在那些地方侵犯人权的情况非常普遍,犯罪者认为他们可以逍遥法



Videre工作人员在筛选“调查员”偷拍下来的录像。

外,因为国际媒体远在天边。

一些“调查员”很大胆,在监狱、太平间和露天集会上公然拍摄,结果遭遇威胁和暴力。“我们有尸体停在太平间的录像,死者生前曾遭殴打、射击——你可以看到子弹还在他身上。”迈克说,“他在一个农场工作,农场主虐待他们。”

迈克最近回到祖国,想在一个政治集会上拍点东西。“但我失去了勇气,开始没能启动机器,因为我太害怕了。最终我不得不藏在一辆卡车后面开始拍。”

“我感到难过,非洲社会有些东西正在破碎。”他说,“我们以友善闻名,以团结闻名。我们互相支持着度过饥荒——今天整个村庄来我的地里,明天去你地里。而现在人们正因为政治互相杀害,互相伤害。”

Videre有一组录像就凸现了食物的政治化:主要政党的支持者可以拿到整袋的粮食种子,作为主食,而反对派的支持者根本领不到吃的。

Videre非常重视录像的真实性。他们会分析背景、元数据,然后交给一个团队进一步审查。翻译工作由一人以上完成,以保证语言的细微差别得到充分理解。如果对材料的真实性有任何怀疑,就不会发布。

一旦编辑完毕,Videre的录像就免费发布在当地或者地方媒体,也通过BBC、CNN和其他机构在美国、英国等地播出。Videre的策略是在主流媒体有目标地投放,同时在YouTube特定频道——比如人权频道——发布资料。有时是匿名发布,鼓励支持者将链接通过推特转发,或者通过社交媒体新闻聚合器Storyful贴出去。最近它发布了一个公开拍摄的短片,希望帮助终结女性割礼(FGM)。一名女子在片中讲述她过去如何使用剃刀为女孩行割礼,现在她成了反FGM斗士。雅科布维奇说,Videre合作者带着短片逐村播放,产生了积极影响。

埃迪去年开始在地区办公室工作。第一天上班时他看到的录像是一名男子的睾丸被人用一把锤子捣烂。Videre不会发布这样的视频。“我们称这种为极端暴力色情。”埃迪说,“不希望它出现在媒体上。我们的主旨不是让人震惊,而是催生改变,我们要避免常见的非洲偏见,那是暴力的源泉。”

埃迪说,他应聘这份工作时,雅科布维奇曾几次就工作的性质说谎,那空泛的解释让他心生疑窦。“我父母认为他们想偷我的肾。”他说。现在埃迪自己也经常“撒谎”,为信使和其他人安排住处时,他总是用假名,使用现金付账。

这天晚上,雅科布维奇和卡洛斯商量着走哪条路线去见不久前从邻国过来的三名“调查员”。其中两位坐了18个小时的汽车,第三个——他们称之为“主席”——是飞过来的。我们在第三方旅馆见了面——既不是“调查员”下榻的地方,也不是我们下榻的地方。所租的房间比想象的要大,好像是办宴会用的,于是我们聚在长桌子的一角,雅科布维奇打开音乐,避免对话被别人听到。卡洛斯向三人展示了他新设计的偷拍设备,他们看上去不太感兴趣——其中一个有着橡胶底座,上面可以贴上旗帜或者其他图案,但在那个“恐怖国家”不适合带这样的东西,太显眼了。

三名“调查员”中,两位30多岁,一位20多岁,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冒着很大风险帮Videre干活。“主席”说到一名“调查员”在集会上拍摄时被抓,遭到殴打,对方说如果不讲出联系人,就杀了他。“当那个人的上线按计划每月一次到他家去拿录像时,也被捕了。”他说,“他们把他关了几天,不给东西吃,狠狠地打他,然后把他带到一个水坝,把他扔下去,他以为自己快要淹死了。但他们又把他拉出来,说:好,现在讲吧。于是他就说了。”

Videre通过律师和地方调停人把那人弄了出来。“他抖得厉害,痛苦难当,觉得招供很不应该。但我们安慰他说没事,说了对他更好。他有妻子,有孩子,在他失踪时我尽量安慰他们。他们是勇敢的人,但是风险在那儿。”

“主席”知道,像卡洛斯一样,安全机关知道他的身份——虽然也许不知道他的真名。他也面对逮捕,但表示不怕。“我还没被抓过,我祈祷永远不会。我每次都小心,但也做好了准备。”他说。“我相信这是唯一能让这个国家发生改变的办法。我们带着热情做这件事,明白它是有风险的。我已做好准备。”

年轻点的那位“调查员”刚刚有了孩子。他为孩子取了一个卡洛斯的化名,以示敬意。尽管年轻,卡洛斯却像是许多“调查员”的父辈,他说很多人给自己的孩子取他的化名。

目前希望进一步扩大规模的Videre开始了一场筹款运动,这让卡洛斯面临的风险增加了——不只威胁到他的婚姻,连他被捕的风险也在增加。

这一切值得吗?

“值得。”卡洛斯说,“但我不会一直这样生活。”

原作:David James Smith

原载:Wired

网址:<http://www.wired.co.uk/magazine/archive/2013/09/features/videre>

编译:Dawn